

## 第一章 我的出生及成长

### 我的第二故乡—台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成长”和“相遇”，正是这些千变万化、错综交织的经历形成了今天的我自己。

我认为，所谓“人各不同”，也可以说是，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人也必有其难能可贵的地方。

一个人在他开始懂事的少年、少女时代，他所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在接受能力最强的二十岁前后，他有过什么样的体验，以及这些体验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经历的，所有这些，夸张点儿，可以说是左右一个人一生的根本因素。

我的这一生虽然很平淡，但我心中也有我自己的“定位”。这种“定位”，是基于我青少年时代的第一记烙印，这点至今我都强烈地感觉得到。没有了这种“胎记”，就无法说清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我自己是如何同中国以及广大亚洲地区的人们打交道的。

1931年（昭和6年）7月11日，我出生在东京。这一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满州事变”（柳条湖事件）发生的那一年。

我自己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则是从三岁时开始的。我已故的父亲那年作为日本“总督府”的一名小官员被派到了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于是，这就开始了我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

最初，我们一家住在台湾的省府台北。此后，先后移住过板桥、基隆、淡水等台湾北部的几个城市。后来听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辗转各地，是因为父亲是个土佐佬<sup>（注）</sup>，脾气顽固、乖僻、固执，老是对上司陈述自己改善殖民地政策的意见，一旦上司不采纳他的意见，便就与上司闹僵，所以总被调换工作。

（译注：日本土佐的人生性倔强梗直。）

#### 赤脚与米粉

父亲的这些事，对年幼的我来说自然是毫无关系。我随着家人不断辗转他方，每到一个新地方便溶进新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着。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在烈日当头之下，孩子们光着脚丫子在砂石道上跑来跑去的情景。“本岛人”（当时日本人这样称呼台湾的中国人）的孩子们都那样玩，我也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跑来跑去，脚底硬得都长了茧。

每次只要从母亲那儿得到一枚一元硬币，我总是光着脚跑出家门，直奔本岛人开店的小

街。在那儿买些“李干”（酸甜味的干梅子）啦；“芋冰”（用芋头做的冰激凌）啦；“油榨果”（面粉做的细长形的油榨东西）啦；“甘蔗”什么的，这些都是台湾的孩子们喜欢吃的零食。

在家里我们经常吃本岛人爱吃的米粉。母亲做的米粉的口味，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因此，以后每当我对初次见面的中国人或华侨作自我介绍时，总是顺口说出“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我想说的意思是，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

可是当时的台湾毕竟是日本的殖民地。随着开始懂事，我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少数的日本人对多数的当地人，有一种明显的不同、一种明显的歧视。

在孩子们之间，一有争吵，日本人就用脏话侮辱当地的孩子。日本的孩子对当地的孩子一直就是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而本岛人，也就是中国人的孩子，总是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在这种场合，尽管还年幼，可我也决不是例外。在比我大五、六岁的小日本孩子王的指使下，我也不明事理地加入干过这种以多欺少的可耻行径。

#### 林肯的连环画

但是，我这种顽童之心不久出现了转机。那是从台北搬到近郊的小城镇板桥后刚上小学没多久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小人书，这本书打动了我的心。这就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连环画——《林肯》。

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林肯赶走了一群追打田鼠的顽童，并把他们痛打一顿，救出了那只田鼠。另一个故事是，林肯把钓了一天好不容易钓着的一条鱼，送给了从家门口经过的士兵，因为他们是母亲说过的“保卫祖国的了不起的人”。还有一个故事。林肯冒着倾盆大雨在赶着去处理重要事情时的途中，看见了一头掉在路边水沟里痛苦挣扎的小猪娃，就把它救起来带回家中在炉边给它取暖。林肯一生为了奴隶解放，发动了南北战争，为人类的平等和消灭种族歧视献出了一切，最后倒在凶弹下。

刚刚学会了认字的我，忘乎一切地看完了这本书，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林肯迷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欺负过本岛人的孩子。而且看到欺负台湾人的日本同胞，虽然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但也开始觉得那是不合情理的了。

一个晴天的傍晚，有四、五个日本小坏蛋，把本岛人在矮墙上晒着剩饭的筐子都给打翻了。好不容易才晒好的干饭块被扔到砂石道上摔散掉了，可这些干饭对当地人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食粮。

一个本岛人的孩子刚提出抗议，一群日本小坏蛋就围了过来，对那孩子大打出手。我站着离他们不远，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不禁大喝一声“住手”，猛地冲了过去，把那个抓住本岛人孩子胸口、跟自己是同类的日本孩子给撞飞了。也许是被我的来势凶猛给吓坏了吧，那班小坏蛋没敢还手就都逃散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验。那天晚上，自己也特别兴奋，怎么也睡不着。后来那天傍晚发生的事，我始终没敢跟父母说。也许那班孩子不是常在一起玩的，所以，那个小小的事件，倒也没惹什么麻烦。

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对林肯的崇拜是越来越强烈了。到了高小以及进了初中以后，这种心情一直没有变，在书店里只要一看到林肯的传记什么的，就会毫不犹豫地掏出仅有的零花钱买回来看。

“你也许能够永远欺骗一部分人。或是，也许能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为人民的、来自人民的人民政府是决不会从地球上消灭的”。

少年时代记住的林肯的这些名言，现在还清晰地印在脑海里。父亲给我的一本连环画小人书，使我结识了美国第十六届大总统林肯，我的人生为之一变。这便是我人生中的第一记烙印。

#### 父亲的战死

我家住在淡水时，父亲被抓了壮丁，那是我小学三年级快结束的 1941 年（昭和 16 年）的 2 月上旬。在短短的三个月后，即 5 月 25 日，父亲就在福建省福州太古镇附近战死了。

那年夏天，在台湾南部高雄父亲所属的台湾第六部队，为在同一战斗中死亡的十名将兵举行了合同葬礼。葬礼结束后，在部队的一个房间里，我们听了当时战斗情况的报告。说是主力部队出击以后，连父亲在内只有十个人留下来守家，遭到了一千多“敌人”的包围，他们是如何勇敢作战，壮烈战死的。如此这般滔滔不绝。

那天天气热得要命。我听着这么长的报告，一边眼泪滚滚流，一边把送上来的冰棍儿大口大口地吃了好几根。母亲责备我好几次，但天太热，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到现在，只要提起那次部队葬礼，留在脑子里最深的倒不是父亲的“武勋传”，而是那冰凉爽口的冰棍儿的滋味。

失去父亲的悲痛是深重的。父亲是我们这些被遗留下来的一家六口（母亲，加上我们兄弟五人，我老大）无法取代的顶梁柱。也许是我刚上四年级时父亲就死了的缘故，我对父亲有一种美好、纯真的印象。

但是对在战斗中直接打死了父亲的中国人，我却不可思议地竟没有产生憎恨感。虽然当时我们的脑子里被灌输的是，这个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可我却对中国人没产生憎恨感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这个“责任”，我想就在父亲自己身上。

## 与“本岛人”的情谊

如前面所述，父亲的官吏生涯并不一帆风顺。开始在台北，后来一直在地方工作。改善政策的意见陈诉也没像父亲所期待的那样被采纳，与上司处得也不好。其实，来我家找父亲的人倒是本岛人多。来的都是那些对不合理的殖民地政策提出陈情、抗议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父亲都让他进屋，倾听他的意见，哪怕是深更半夜。夜里我起来上厕所时什么的，能看到从拉门的空隙处漏出的灯光，能清楚地听到当地人说话的声音。

父亲对他们的苦衷，无法保持沉默。然而却又无法把他们的这些苦衷反映到政策里去，因此，父亲一定是感到很憋气的。在那种情况下，父亲送给我一本《林肯》的连环画，也许是想把自己平日里这种心情转达给自己的儿子吧。

日本战败后，我曾帮着整理放在壁橱角落里父亲留下的书籍。英语、德语等洋书很多。日文的书籍也不少。我打开用报纸包着的一本书，眼光停在了那本书的题目上：《一个青年的手记》。这本书中描写的是一个贫穷的外国青年到处遭受迫害，转辗各处，却不断敢于向世上不合理的东西挑战的故事，当时我正上初中二年级（以前的台北一中），我从书中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父亲的影子。

回想起在台湾渡过的少年时代，可以说在《林肯》的连环画中，以及在已故父亲与当地人的交往中，我找到了自己生活准则的起点。也许有点儿夸口之嫌，但确实是从那以后对不同民族或人种的歧视我开始心怀疑念，并开始萌发了一种愿望：大家都应该有真正的平等。

## 人下人的日本

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第二烙印”则是从台湾撤回日本内地的时候。日本战败后生活贫困，同时在日本遭到了“歧视”，这对我打击很大。

已故的父亲祖籍是日本高知县。现已过卒寿（九十岁），还健在的母亲是日本宫城县的人。我们兄弟五个（三男一女），我是老大，在东京出生，从三岁到十四岁是在台湾渡过的。

但是，日本战败的第二年，即1946年（昭和21年）2月，我们一家撤回国的落脚地却是毫无亲缘关系的奈良县。这是由于在台湾认识的一位复员兵的好心所至。

我们家不仅祖父和父亲，连父亲的兄弟也都在战争中死去了，而且从祖父那一代就移住到了台湾，所以也就没法回高知了。母亲的双亲又都不在世，回宫城去也无处安身。

## 撤返奈良

一愁未展的母亲，决定回到东京，因为她跟父亲是在那儿走到一起的。父亲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家排行老二，所以过继了母亲的姓。而且那时，母亲的父亲已不在世，于是我父

母当时就把开始人生新生活的早稻田林野附近的“东京都淀桥区户家町”（现新宿区西早稻田）当作了籍贯所在地。

日本战败后，在我家管理伙食的五名士兵的负责人叫木谷。他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回东京，他说：

“去东京可不得了。去奈良的话，好歹不至于饿肚子。我有一个姑姑在奈良的乡下。”

母亲对他的好意很感激，但还是婉言谢绝了。母亲在每一件行李的木札上，都写上了东京籍贯的地址。一家六口来到基隆港，只等撤返船的到来。

在决定三天后就要登船了的那天，那五名士兵查到了我们的住处，从台北匆匆赶了过来。木谷告诉我们，“东京的情况我已经问过了。听说，那儿都已成了废墟。你一个女人，还要供养五个孩子，去东京是不现实的。这是给我姑姑写的信，拿着。”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木札上的地址用刨子刨掉，全写上了“奈良县南葛城郡葛城村僧堂”（现属于奈良县御所市）。母亲热泪盈眶，接受了他的好意。

2月23日一早，撤返船抵达了还是严冬季节的和歌县田边港。我们都是在南方长大的，只觉得内地的冬天寒冷刺骨。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以后会怎么样呢？带着五个孩子的母亲，当时她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现在一想起这些，我心里还隐隐作痛。

不过，我们家还是算幸运的。接纳我们一家的木村家是村里的地主，可同我们家一样，父亲已经去世，而且与我们同龄的孩子很多。老大叫宗雄，性格开朗，头脑灵活，得知跟我又是同年级，我们马上就成了好朋友。

木村一家，为我们腾出了一间六帖和一间四帖的侧房，使我们从心里感到了莫大的欣慰。母亲因有教师执照，经村里人的介绍，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当上了老师。我们兄弟几个也各自开始上学。在内地的生活总算有了一个开端。

### 食粮紧缺的时代

葛城村座落在楠木正成曾据守过的千早城遗迹的金刚山麓。我先在县立的亩傍初中上学。由于学区制的改革，不久就转到了新制的御所高中，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自行车，我每天穿着高脚木屐往返十五公里。当时的砂石路现在都成了柏油马路。

高脚木屐，穿上个把来月木屐齿就会磨掉，弄坏底板。这时候，就得把硬木头削成齿再安上去，继续接着穿。木屐齿磨平了，再做一个安上去。等第三次换的木屐齿磨平了，木屐底板前面的脚趾处也就磨坏了。无法再继续穿时，这才给买双新的。

日本战败后，食粮紧缺。同城市相比，农村情况稍好一点。可由于我们家是“非务农户”，所以日子也不好过。

一天只有两合多的配给米，这对正长身体的我们来说，是根本不够的。当时，母亲一个

月的收入是三百日元。黑市米一升（一升十合、一合约一百八十克，）就要一百日元，我们根本买不起。而且，那时候几乎没什么菜。一升米，一家六口人如果放开肚子吃的话，连一顿饭的量都不够。

我们只好经常吃“面疙瘩汤”（把面粉用水揉成团子放进汤里煮成的食物）。但面疙瘩里面掺着很多米糠或麦糠（小麦碾成粉之后剩下的皮）。带到学校去的饭盒里下面放着厚厚的一层豆腐渣，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米和麦一起煮成的饭。

那时我经常与弟弟妹妹一起到河堤上或山上去采挖野菜来吃。“鸡儿肠”啦、“蒲公英”啦、“笔头草”、“野蒜”、“紫萁”、“蕨菜”啦什么的，凡是能吃的野菜都吃过了。可整天还是饥肠辘辘，陷入了营养不良的状况中。

不久，稍后从台湾撤离回国的姑姑和表妹俩也过来跟我们一家六人住在一起。现已故的姑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从小就把我和我大妹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疼爱。姑姑在村公所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兄妹六个，正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两个人拼死拼活养育我们。后来，生活才慢慢地好了一点。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段相依为命，力求生存的时光产生一种大家庭独有的温暖和怀恋之情。

#### 内地的歧视

上御所高中后，我发现了一个怎么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台湾，我曾有过同样的体验。那就是日本历史上由来已久，一直未能解决的“部落问题”1)。

一般的家庭，即“非部落”出身的人，只要是提到与部落有关的话题，就特别敏感，会马上变成另一个人。即使是成绩优秀、理应有理智的学生也会谈虎色变。在部落出身的人之间，他们也能彼此感觉得到长年积累在心理上的那种屈折。

也许是由于处在战败后的荒废时期，课间休息时，在教室里有注射菲洛本的人，也有在校园没人看到的地方，手持匕首走来走去的人。如果你从他们身边走过，有的你稍微碰一下他的袖子，都会威吓你说，“喂，老兄，拿出十元来。”这些现象出现在校园内，管纪律的教师也是束手无策，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这些行为总是或多或少与部落出身的学生有关。这跟战争受过日本折磨的台湾“本岛人”的孩子，在日本战败后，报复日本人的光景很相似。即便如此，在台湾所发生的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歧视所造成的，但在日本内地看到的却是日本民族之间发生的、而性质却完全相同的问题。

实际上，对我本人来说，这些与我年幼时在台湾的体验，完全重叠在一起了，正因为如此，对我这个撤返回到日本来的“外人”来说，更是令人揪心了。不管理由是什么，我一直认为，人为地制造出这种“不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人，正是问题的所在。

“探索共生之路”

我进了学生会，设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主动与部落出身的有才能的学生进行交谈，让他们在学生会及俱乐部活动中当干部。积极举行班级间的棒球，排球等友谊比赛，致力于创造一个在公开场合下，没有隔阂，能倾心交流的气氛。

部落的同学中如果有谁长期旷课的话，我们在放学后就跟老师一起去家访，跟其父母亲促膝交谈。如果有人打恶架而住进了医院，我们就跟打架的双方一起去医院探望，大家一起讲清原因并握手言和，以防再发。

当大家的心扉开始相互打开时，我就把各部落的代表叫到一起，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建议。

“从明天早上起，上课前的一个小时，即七点前，大家每人带一块抹布来。从明天起一个月的时间，由我们来打扫走廊吧”。

当时，非部落的学生们对部落的学生还存在一种蔑视和恐怖感，我这样做是想消除他们这种感觉。

第二天一早，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分钟，报名参加的十二个人就全部到齐了。大家立即分工，一齐用抹布擦起来。四十分钟后，木造的两层楼教室的所有走廊都被擦得干干净净。一般的学生知道后，也陆续参加了进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校长和管纪律的老师，以及家长们看到我们的行动都很吃惊，给了我们很大的表扬。这样一来，互相信赖的关系一建立，干坏事的也就明显地减少了，学校也就变得明朗、有生气了。

日本近代化的背后

记得我还是个青年记者的时候，曾跟一位台湾籍的华人老前辈交谈过，他说：“我们曾属于‘第四种日本人’”。我当时不明白其含义，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据他的看法是，第一种人是大和人。第二种人是归化了日本的日本人和部落民。第三种人是虾夷人和琉球人。身分最低的第四种人就是朝鲜人和台湾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少年时代的最宝贵的体验就是对“第二种人”在和“第四种人”的交错之中所产生的不合理的现象做出的那种本能的反应，也是我的挑战。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欧诸国学习，推进了近代化。其中先见之人留下了“上天不作人上人，亦不作人下人”的名言。不错，封建时代身分制度的改革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那主要是在“大和人”中间进行的。

实际上，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大和人”一面歧视周围的“日本人”，一面强行同化政策。

这种行径后来在“八紘一字”、“大东亚共荣圈”（译注）的招牌下，扩展到了对中国大陆乃至亚洲近邻诸国的侵略行为。

（译注：“八紘一字”，“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妄想称霸世界时的口号，“八紘”意为四方四角，泛指世界各处，源自《淮南子 地形训》；“一字”意为同在一个屋顶之下，源自《日本书记》“兼六和以开都，掩八紘而为字”。一下同。）

### 在大学选择了亚洲之路

世上不少事是偶然重叠的。但我总觉得，我日后对中国以及亚洲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与我在台湾和奈良所得到的“两个烙印”是分不开的。

#### 寄人篱下的勤工俭学

也许是家里太穷，我中途曾放弃过进大学的念头。高中时，我努力投入学生生活，先后当过学生会会长，啦啦队队长，辩论部部长和长距离接力赛运动员，自己的青春的时光非常充实。但在母亲眼里，好像觉得儿子这样做没什么出息，非要让我上大学不行。老师也劝我“一定得上大学”。

在乡村的高中里，当时的学习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学得并不扎实，所以最后还是高中毕业后，才全力投入高考复习，我比同龄人晚了两年考进了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和国际关系论（主要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关系学）。当时搞“外国学”，就得学英语，因为研究欧美问题的风气还很盛行。但我却想，要搞就得把眼光放在有关中国及近邻亚洲诸国的研究上。

我原打算到了东京，先住进学校的学生宿舍，再找份工，怎么也能对付。但这打算一开始就落空了。当时，要进被称为“贫穷学生之巢”的东京外大的学生宿舍特别难。我在入学表格上老老实实在地填了“家有若干汇款”，结果不容分说就被拒之宿舍大门之外。

事已如此，东京的生活只好一切从打工开始。最开始的工作就是“挤牛奶”，吃住在雇主家。

打工的地方就在中央线的东中野车站向西南走七、八分钟的地方。东京空袭后的残骸依然四处可见，在残留着约一块二百来坪（约六百六十多平方米）地的一角，有一间小屋，里面饲养着八只山羊，小屋旁边围着栏栅。小屋是一个简陋的板房，里面只有一间六帖大的地板屋和一间三帖大的没铺地板的房间。雇主同一个三十来岁姓 K 的住在里面，再加上我这个新来的“闯入者”。

因为白天要上学，所以早晚的工作特别够呛，而且没有星期天。再加上把“住宿费”一



扣，到手就分文不剩了。

每天早上我四点半就起床。挤奶、消毒、装瓶。早上 K 去送货的时间里，我就准备早饭。然后去上学。当时，大部分的学生是穿校服带校帽、背皮革的书包。而我是穿着已故父亲的棉衣改做的外衣，没有帽子。用包衣服的包袱皮包着书，脚上穿着木屐。

下午 3 点后，从学校回来，就推着拖车，到豆腐店和米店买回“豆腐渣”和“麦糠”。把从购奶的用户那儿收集来的菜头和水果皮跟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拿去喂山羊。然后是洗“奶瓶”、“挤奶”，准备晚饭。晚饭后洗碗，给山羊喂好夜食，10 点后去公共澡堂。快 12 点时才能睡觉，一倒下去便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四点半起床。每天就这样千篇一律地渡过。

母亲每个月给我寄来两三封信。月末的信里，一定要随信寄来三千日元。当时母亲的工资，由于物价的上涨，加到了每月五千日元。母亲把每月工资的一大半都给我寄来了。留在乡下的弟弟妹妹们，不知是过的怎样的日子。每每想到这些，心里都隐隐作痛。母亲寄来的信我从不在别人面前打开，而是走到外面，在月光下细读。每次读信都是泪流满面。

“我为什么非来东京？是为了吃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吃？”

#### 破旧的学生宿舍的生活

我这样不断地自问自答。半年后的 10 月中旬，我下决心离开了打工的地方，偷偷地溜进了学校的学生宿舍。刚开始觉得矮人三分，但在穷伙伴们的温情感染下，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外大的学生宿舍，可以说是东京最宽但也是最破的。一间十六帖到十八帖的房间里，住六个人。房子的建筑很粗糙，到了冬天寒冷的北风便从门缝里毫不客气地往里钻。大家都钻进壁橱里，把苹果箱子当桌子，用台灯来取暖看书。睡觉是睡在榻榻米上面，早上起来时，前一天晚上用来取暖的喝剩的白开水早已冻得硬棒棒了。尽管这样，但在这儿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充足的时间。

不久，我得到正式批准住进学生宿舍。上大二的时候，我参加了学生宿舍举办的选举，当选为“委员长”。说起来也许很丢人，当“委员长”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委员长”和“炊事委员”可以不交伙食费。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个出身乡下的单纯的学生也开始懂世故了。

破旧的学生宿舍也有其快乐的时刻。那就是每周一次巡回来到的合唱练习。

附近的街道工厂或中小企业里的年轻工人也可以来自由参加。除了日本、俄罗斯的民歌外，中国的民歌也学会了不少。合唱时，我一直是唱男低音的。

那时学生宿舍里，经常有左派团体或党派关系组织的人来劝诱我们加入，我是什么组织也没参加。

但是对于学生运动，我也有我的主张。

当时，我是东京都内的学生宿舍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曾积极参加过阻止对贫穷住宿学

生的生活和权利的侵害行为的活动。

其中有一次是当时的自治厅下的通知，说是要把地方籍学生的选举权转到父母家的户口所在地。其目的是想把城市里强硬的左翼政党的支持票给分散开。我们外大住宿生带头表示反对。我们到自治厅和区公所去进行陈情和抗议。每天早饭一完，就把食堂的桌子抬出去，到中野站和东中野站搞签名运动。那时候，本来对学生运动不关心的人也来参加，我们获得的签名人数比东京都内任何一所大学学生宿舍的都多，这在其它大学也成了话题，还有不少别的学生前来我们学校取经。

### 毕业论文研究《矛盾论》

上大三后，我搬出了学生宿舍。那一年，我找到一处便宜的“住处”，一边送报纸，一边看书准备毕业论文，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毛泽东《矛盾论》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黎明前的中国，存在着繁多复杂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在这所谓的矛盾中有两个是起支配作用的矛盾。一个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中国内部的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的压迫沉重的时候，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其压迫减轻时，后者就成为主要矛盾。

但是，这两个主要矛盾有着其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在革命未成熟的阶段，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力量处于次要的方面。但随着革命的发展，次要的方面就转换为主要的方面了。

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就“事物的性质”所论述的一段：

“事物的性质是什么？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因此，主要矛盾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发生变化，事物的性质也随之变化”。

这段文章以前我看过很多遍，不过是一目而过。但作毕业论文再重读这段文章时，给我的印象越来越深。自己往往容易陷入把事物的性质看作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里，毛泽东这段话给了我启发，使我有新的认识。

我充分利用我自身的体验和思索，完成了毕业论文。尽管是四百字一页的共 35 页的小论文，但指导论文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挺不错。”

上大四后，我搬回到学生宿舍。尽量减少打工时间，准备就职考试。

校内就职商谈时，清水元助主任教授对我说，“你当新闻记者吧。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密切注视中国及亚洲的新动向”。但田中清一郎副主任教授却对我说：“你去乡村当小学教师最合适。这是培养下一代年轻人的重要工作。”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当记者的道路。而三十五年后，我在朝日新闻下属的“朝日中国文化学院”教上了中文和中国概况。这好歹算是顾全了已故的两位恩师的嘱托吧。

原注

1): 部落问题

这里所说的“部落”，就是指“受歧视部落”。在德川幕府时代政治性制定的士·农·工·商·秽多(即贱民,译注)·非人这一制度中,与“四民”(士,农,工,商)有别,被贬为“秽多,非人”人们集中居住的地区被称为部落。

据《广辞苑》和《朝日现代用语·智慧篇》(1993年版)等登载,“秽多,非人”是指在江户时期被贬为贱民的人们,他们不从事生产性的劳动,在社会底层从事游艺、押送罪犯、掩埋尸体等工作。1871年(明治四年)的解放令废除了秽多·非人的称呼,从而转用“特殊部落”这一蔑称。

此外,还有“未解放部落”这一称呼,在1969年开始的对受歧视部落的行政改善之后,在法律上对得到了改善的部落称为“同和地区”。据1968年的政府调查,“同和地区”在日本全国一千一百二十七个市町村的四千六百零三个地区里约有一百一十六万人。按地区来看,包括关西地区在内的西日本占78.8%,关东地区占13.7%,中部地区占7.5%。

另外,据这个问题的研究权威——解放出版社的《部落问题事典》上的记载,部落问题的现状如下所述。

“现在,在法律和制度或在社会身份上,不存在部落或部落民了。而且,日本国宪法第十四条上明文规定:‘所有的日本国民在法律下面人人平等,不因人种·信条·性别·社会门第的原因,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关系上受到歧视’,表明了尊重基本人权的理念。因此,表面上部落歧视这种非民主的对人的歧视是不可能有的。可是,就是这个不可能有的东西,客观上却依然存在,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六千个部落,三百万人’布满了日本全国。”此外,还指出了以下真相。

“在法律上、制度上对部落的身份上的歧视已经在表面上、形式上消灭了。因此,连要统计有多少个部落以及其部落的人数这个问题本身都成问题。而且,在法律上、制度上已经不存在部落了,所以要指定或判断这儿那儿是部落,这也都谁也作不到了。然而,事实上,由于错误的社会传统观念和偏见,长期以来被看做是部落的地方,而且现在也一直是那么看的地方就是真真实实的部落,在这个所谓的部落里出身,部落里成长,现在还住在部落里的人们,还有不久前流入到部落里来的人们,或是虽然居住在部落外面,不久前与部落有了血缘关系的人们,他们都被看成是部落民,这点正是当今的现状”。